



文天祥传

万绳楠

文天祥传

万绳楠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丰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用传、论、考相结合的方法，对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对他的哲学、政治思想和文学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富有创见的考证和论述。它对于研究南宋末年的历史、哲学和文学，对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参考价值。

文 天 祥 传

万维楠 著

责任编辑 陆树庆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74千字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300册

统一书号11105.91 定价2.60元

序 言

本传是作为史学传记来写的，不同于文学传记。

本传力求做到传、论、考相结合。传中对以往被忽略的问题，如文天祥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成就以及具体事迹的思想基础，进行了论述。对以往记载有出入的问题，如文天祥究竟是哪里人，多少岁中状元，某些作品写于何时，进行了考证。对以往记载较为混乱的问题，如南宋太皇太后谢氏投降的经过，参照各种史料，进行了清理。对被视为定论的问题，如南宋必亡论，根据史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事迹本身，则力求言之有据。凡此，均求接近科学，力求做到史论结合。

本传是想通过文天祥的一生活动，把历史上一个兼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的民族英雄的形象，摆到读者眼前，并借此对南宋晚期的历史，作些必要的清理工作。如果能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对发扬我国爱国主义的光辉传统，有所裨益，那将是我的希望。

本传的撰写，得到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与协助，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第一章 文天祥的诞生与成长 (1)

(一二三六年——一二五五年)

第一节 文天祥的籍贯问题 (1)

第二节 文天祥诞生和成长的时代 (7)

第三节 文天祥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 (19)

第二章 为“法天不息”，实现公道与直道之政而

斗争 (28)

(一二五六年——一二七四年)

第一节 在殿试和初官的时候 (28)

第二节 在知瑞州、江西提刑与知宁国府任内 (42)

第三节 在讲读与当制任内，山居与起复 (51)

一、说度宗，斥师臣 (51)

二、身在深山，心在云表 (58)

三、在湖南提刑与赣州知州任内 (62)

第三章 第一次起兵抗元 (69)

(一二七五年——一二七六年)

第一节 “剑戟挥过赣城，勤王又会数千兵” (69)

第二节 “出师自古尚张皇，何况长江恣扰攘” (79)

第四章 “不是谋归全赵璧，东南哪个是男儿” (98)

(一二七六年一月——三月)

第一节	舌在纵横击可汗，虏中方作丈夫看	(98)
第二节	万难脱京口，九死走通州	(115)
第五章	第二次起兵抗元	(140)
	(一二七六年闰三月——一二七八年十二月)	
第一节	南剑日杲杲，幕府盛才贤	(140)
第二节	皇帝何处觅，东南只独撑	(153)
	一、江西庆大捷，号令通江淮	(153)
	二、“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	(162)
第六章	“万里行役”	(181)
	(一二七九年一月——十月)	
第一节	叹零丁，哭崖山	(181)
第二节	正气未亡人未息，梦回江路月风清	(193)
第三节	“荒草中原路，斜阳故国情”	(206)
第七章	“楚囚一杯水，胜似九震厄”	(217)
	(一二七九年十月一日——一二八二年十二月九日)	
第一节	“议论操坚白，精神入汗青”(枢密院引问 前后)	(217)
第二节	纸上飞蛇喷香汁，一点光明射南极	(234)
第三节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52)
第八章	文天祥的爱国思想剖析	(266)
第一节	文天祥爱国思想的哲学基础	(266)
第二节	文天祥爱国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表现	(275)
第三节	文天祥爱国思想在抗元方面的表现	(282)
第九章	文天祥在文学上的成就	(290)
第一节	文天祥论诗和他的早期诗歌	(291)

第二节	文天祥的第二期诗歌（《指南录》）	（303）
第三节	文天祥的第三期诗歌（《指南后录》和《集 杜诗》）	（320）
第四节	文天祥的散文与词	（336）
第十章	关于文天祥的传记与祠祀	（347）
第一节	关于文天祥的传记	（347）
第二节	关于文天祥的祠祀	（353）
附：	文天祥事迹编年	（359）

第一章 文天祥的诞生与成长

(一二三六年——一二五五年)

第一节 文天祥的籍贯问题

文天祥是哪里人？这个问题似乎解决了，其实没有解决。一是县籍。元朝修成的《宋史》说文天祥是“吉之吉水人”，而元人刘岳申写的《文丞相传》，又说文天祥是“吉州庐陵人”。后世主庐陵之说的颇多，但并未驳倒甚至未去触及吉水之说。二是乡镇。主庐陵之说的，都说文天祥是庐陵淳化乡人，但为什么是淳化乡人，则未交待。再者，《文信国公集》中，明明有淳化和顺化二乡，而清修《庐陵县志》却说淳化乡“即宋顺化乡”（卷二《地輿志》淳化乡条）。杨德恩的《文天祥年谱》驳斥了《庐陵县志》的说法，以为“今公集中均作淳化，未有作顺化者。”但这是以错改错。杨德恩没有注意到《文信国公集》中自有“顺化”。由此可见主庐陵之说的人，连淳化乡本身也是没有搞清楚的。三是村落。主庐陵之说的，都说文天祥是庐陵淳化乡富田村人。可是《文信国公集》中只有“富川”，而无富田。文天祥说他的先祖“由永和徙富川”，清林有席《文丞相里居考》（见《庐陵县志》卷五十一《艺文志》），在引用文天祥此话时，竟将“川”字改为“田”字。杨德恩的《文天祥年谱》引用文天祥此话，虽未改川为田，但却说什么，富川“即富田也”。这完全是

意测。

凡此都可以说明文天祥的籍贯，至今并未确定，仍有详考的必要。

按《文信国公集》（以下简称《文集》）卷十行实《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说文氏“由成都徙吉”，文革斋（文仪）的五世祖文炳然“居永和镇”，高祖文正中“由永和徙富川”。这说明从文正中迁富川起，到文天祥止，文氏六代人都居住在富川。文天祥为富川人，且诞生于富川，是毫无可疑的。

富川，文天祥说了是吉之富川。吉是州名，非县名。这里要问富川属于吉州哪一县？

文天祥在《邹月近墓志铭》中说到：富川为“庐陵南方”的“上游支水”之名，这条支水来自赣州兴国县。邹氏世居富川，而文氏为邹氏的“邻”居（《文集》卷十）。《与庐陵李知县沈孙书》中，又有“某（文天祥自称）邑人也”的话（《文集》卷三）。据此可以断定：文天祥是庐陵南方的富川人，庐陵是文天祥的县籍。

《纪年录》中又记有“文山”。从文山所在地可以推知富川文天祥故里的具体位置。文天祥说：“山在庐陵南百里，居余家上游（就富川支水而言）。”度宗咸淳七年，他在文山起宅（《文集》卷十七）。他的家离文山有多远呢？《纪年录》没有说到，但在《与朱太傅埴书》中，文天祥说过：他曾“于寒舍千步外，得一陂陀，溪、山、泉、石，四妙毕具”，周回“可十余里”。而此陂陀即他在《山中堂屋上梁文》中说到的，“有诡石、怪木、奇卉、美箭之饶”的“坡陀”，亦即文山（《文集》卷三与卷十）。由此可知文山离文天祥故里最近处不过千步，最远处不过十余里。文山既在庐陵城南百里之地，富川文天祥故里也就在庐

陵城南百里之地。

文天祥的《复赣守李宗丞雷应书》，又说“仆家青原深处，实与君侯黄童白叟接畛而处。”（《文集》卷四）按今江西省吉安（庐陵）赣江东岸有青原山，蜿蜒南伸。文天祥的话，说明了文山本是青原山南端的一部分，他的富川故居与文山别墅，离赣州边界不远，即离富川上游所经赣州兴国县的县界不远。文天祥给“吉守李寺丞芾”也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他“居庐陵南隅，盖受廛（廛里、邑居）之最远者也。”（《文集》卷四）所以说“受廛最远”，即因为他住在吉州南隅的边界地方。

居地既明，现在要问富川是不是具有水名和地名的双重意义？如果又是地名，它属于何种性质？

按《邹月近墓志铭》说到邹月近一族，从五代时期起，便居住在富川。又《乐庵老人刘氏墓志铭》说到刘乐庵始祖刘邽，本长沙人。“后徙庐陵富川”。《刘定伯墓志铭》说到刘定伯的十世祖刘德远“徙庐陵富川”。至于文氏的徙居富川，也在文天祥的五世祖文正中时。而邹氏是文氏的近邻，刘乐庵是文天祥的“邻翁”，刘定伯是文天祥的“东家诗人”。这说明在庐陵富川沿岸，很早便形成了一个姓氏较杂而互为邻居的聚落。文天祥但说庐陵富川，表明这个聚落即以富川命名。富川既是水名，又是地名。

富川这个聚落是村庄还是城镇呢？不妨读一下文天祥写的另外两篇墓志铭。

《邹仲翔墓志铭》记理宗景定五年，“寇起兴国”，不久到了太和县的王山，距富川只有“半舍”之远。幸而邹仲翔早已“率乡人栅东门山为备”，富川赖以保全。邹仲翔的父母均葬于富川东门。文天祥在铭中有这样的话：“东门之原，君之父兮；

东门之麓，君之母兮；东门之巔，君所构兮；瞻彼东门，相尔后兮。”由此可见富川周围是有门墙的。

《王推官母仇氏墓志铭》记“东庐王先生母”死后，“厝于城西黄腴山之原”。由此可见富川周围的门墙，实为城门、城墙。

读了这些材料，再读明朝王育仁的《文山旧隐祠记》中的“余宗之居富田（富川）古城者”的话（《文集》卷二十附录），就可确知富川是一个城镇，非村庄。

为什么文天祥要直称“庐陵富川”呢？就是因为富川是一个城镇，直属于庐陵县，地位与乡相等。

环绕富川镇的，有淳化和顺化二乡。富川人死后，可以葬在镇外城门附近，如邹仲翔的父母。也可以葬在淳化、顺化二乡，如文天祥的母亲曾氏，葬“于庐陵淳化乡靖居里三采之原”（文璧《齐魏两国夫人行实》，见《文集》卷十八《拾遗》）；刘乐庵“葬于淳化乡鳧塘之原”；刘定伯“封于淳化乡扶竹坑枫树之原”；而邹月近则“葬于顺化乡新安社之原”。之所以二乡皆可营葬，原因就在富川是镇，不属于淳化乡，亦不属于顺化乡。

以此，我们只能象文天祥自己说的那样，称宋人文天祥是“庐陵富川”人。

为什么后人纷纷说文天祥是宋庐陵淳化乡富田村人呢？关键在元明时期，富川之名隐，而富田之名显。

“富田”二字始见于《宋遗民录》龚开《宋文丞相传》。文天祥自说是吉之富川人，而龚开则说文天祥是“吉州富田人”。他是不是别有文字根据呢？没有。龚开只说他曾“见青原人邓木之藏文公手书《纪年》”，而文天祥的《纪年录》中，并无富田二字。我疑龚传田字为川字之衍。

明宪宗成化二年，罗伦作《宋丞相文信国公祠堂记》，说“公之子孙祠公于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燹，为横民所夺。”（《文集》卷二十附录）罗伦所谓富田之祠，原来并无“富田”之名。明彭序《文信国公祠堂祭田记》说：“宋丞相文信国公祠在庐陵文山之麓，旧有祭田，为豪强所夺。”此即罗伦所谓富田之祠。此祠据《纪年录》辛巳注引文天祥与弟书：“文山宜作一寺，我庙于其中”，应叫做“文山之祠”，而后来却被叫做“富田之祠”了。

明神宗万历二年，王育仁作《文山旧隐祠记》，又把富川古城叫做“富田古城”，把距富川文天祥故居千步外的文山，说成是“距富田里许”的文山。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宋时只有富川，而无富田。川字被田字所代替，是元朝以后的事。因为元朝以后人人这样写，这样喊，讹伪反而化成真实，川隐而田显了。但这毕竟是元朝以后的变化。文天祥既然明明白白说文正中“由永和徙富川”，既然明明白白说邹月近等都是富川人，我们自不能以讹称富田代替富川。

富田又是怎样和淳化乡发生关系的呢？按文天祥的墓地“富田木湖之原”，在明罗元泰《墓田记》中，作“鰲湖大坑之原”，鰲湖属于庐陵。明曾鞏记但说文天祥“葬庐陵鰲湖上”，未说鰲湖属于何乡。而到清朝《庐陵县志》卷六《山川·茔墓》中，则说文天祥墓“在舜化乡鰲湖大坑”。舜化即淳化，同治元年避载淳之讳而改。明人不提鰲湖属于淳化乡，表明此乡建置或所辖范围，在明、清两代并不一样。庐陵富川人文天祥，在元、明时期尚只作为庐陵富田人，到清朝才变作庐陵淳化乡富田人，是非常明白的。历史上地名的更改总是有的，但文天祥既非清人，称呼他的籍贯，自不能按照清朝的建置。这个问题，人们应是懂得的。

根据上面所作的考察，完全可以肯定：文天祥是吉州庐陵县富川镇人。那么，《宋史·文天祥传》又为什么要说文天祥是“吉之吉水人”呢？王雅《原刻文丞相集序》有一个猜测：“《宋史》详注信国吉水人，《宋史》成于元初，去信国不远，必有所据。信国有诗云：‘田园荒吉水，妻子老幽州。’吉水为家，此亦一证。”王雅因此不敢否定《宋史》的说法，只是说：“按公集住庐陵日久，则往来接壤以备阙疑可矣。”（《文集》卷二十附录）这不是王雅一个人的疑惑。

王雅的猜测是有一些道理的。元顺帝元统年间，许有壬为刘岳申的《文丞相传》作序，说到他“早读《指南录》、《吟啸集》，见公自述甚明。”表明文天祥诗文中的《指南录》、《吟啸集》，很早便已流行。《宋史》的作者无疑看过《指南录》和《吟啸集》。而“田园荒吉水，妻子老幽州”之句，正在《吟啸集》的《生朝》一首诗中。这首诗是《吟啸集》的第一首诗。

但许有壬的话也告诉我们：除了《指南录》、《吟啸集》之外，文天祥的其他诗文，在元朝尚未流行，《宋史》的作者不可能占有文天祥的全部著述。在修《宋史》时，他们显然未看到文天祥自述家世的文章。《宋史·文天祥传》一字未提文天祥的家世，便是一个明显的反映。

“田园荒吉水”能不能说明文天祥就是吉水人呢？不能。诗中的吉水与幽州对举，意为吉州之水，非指吉水县。这是写诗的常识，我们不难理解。文天祥说他是“吉之富川”人，此吉即指吉州，此富川即是吉州之水或“吉水”。

至于孙雅说“往来接壤”，富川是与兴国、太和二县接壤，并不与吉水县接壤。接壤说在杨德恩的《文天祥年谱》中也有反映。杨谱引《庐陵县志·地輿志》，说淳化乡“东北接吉水中鹄

乡，东界吉水文昌乡，……”殊不知这是清末的淳化乡（舜化乡），不能套用。接壤说实际上是一个不确定或不可知的说法，并不可取。

第二节 文天祥诞生和成长的时代

一二三六年，文天祥诞生于庐陵富川镇。这一年是南宋理宗赵昀端平三年，蒙古太宗窝阔台八年。理宗在位四十年（一二二五——一二六四）。在理宗时期，在文天祥诞生前后，南宋进入了一个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

要明白理宗时期南宋的内外形势，须先了解享国时间很长的理宗的治国之道。

理宗治国，牢牢守住一条：利用朱熹阐发过的理学思想，贯彻祖宗的根本大法“守（防）内虚外”（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十《屯田》）。他之所以被称为“理宗”，原因也在这里。《宋史》卷四十四《理宗纪四·赞》说：

“自帝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焉。庙号理宗，其殆庶乎？”

初看理宗大倡理学，大变士习，以复古帝王之治，似欲有所振刷，辅佐他的大臣也应都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可是，在他统国的四十年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终始。”史、丁、贾是“外”丞相，尚有一个“内丞相”董宋臣，理宗对于他，更是宠之如邓通，信之如张良。须知理宗和史、丁、贾、董结合的

基础正是理学。而理学的最终目的，在宋是要强化封建专制统治，是要维护祖宗的大法——“守内虚外”。在理宗看来，史、丁、贾、董这种人，才是理学家制定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君臣之道的真正拥护者，是既忠又贤。要守内虚外，就得靠他们。象李宗勉之辈，动不动就爱提什么“修内治”，“严边防”，“节冗费”，“招强勇”（《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传》），未免象王安石，未免与守内虚外的祖法背道而驰，损害赵家王朝专制的利益，是既不忠又不贤。循祖宗之法者忠，欲变祖宗之法者奸；顺封建专制利益者忠，欲逆封建专制利益者奸。这就是理宗的忠奸之辨，这就是理宗的哲学观。

赵必愿说：理宗“独出于断，固欲一切转移之。”（《宋史》卷四一三《赵必愿传》）“一切转移”，也就是要把一切都转到理学的轨道，封建专制的轨道，皇室、官僚、地主利益的轨道，守内虚外的轨道。社会和国家的危机虽然日深一日，些微改革也被视为叛逆。宋朝已经走到它的尽头了。

对于理宗提倡理学，变更士习，看得最清楚的，无过文天祥。他说：“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使复焉。”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正是理宗所要求的士习。时好包括理学，有司指封建专制机器，那是丝毫也不能违背，不能触动的。在理宗的大力倡导下，这种士习算是养成了。而养成这种士习的人，一旦“取青紫而得车马”，所作所为，无非“利而已矣”。那时，“奔竞于势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繁，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整个官场“清芬消歇，浊滓横流。”（《文集》卷一《御试策一道》）须知理宗提倡理学，丕变士习，所要造就的正是这样的官场。官场如果振作，对因循守旧不利。

经理宗改制的专制机器的运转，为害更烈。文天祥指责过朝廷与官吏的病民，他说：“今之生民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僻处东南的南宋，一面是“民力竭矣”，另一面是“琳宫梵宇，照耀湖山”，“霓裳羽衣，靡金饰翠”；“量珠辇玉，幸宠希恩”（《御试策一道》）。形成尖锐的对照。

民困、民竭的严重后果是造成了南宋土地制度的畸形发展。理宗端平元年，刘克庄曾说：“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后村大全集》卷五十一《端平元年札子》）淳祐六年，谢方叔又曾说：“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所谓“贵势”即官家。南宋晚期，某些地方的农民，如秀州（今浙江嘉兴）的农民，竟全部丧失了土地，全部变成了佃户（方回《续古今考》卷十七《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条，有秀州农民“皆佃户也”的话）。佃户处境极为悲惨，“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元典章》卷四十二）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地主从来不出一个钱、不化一点力去经营土地，而是毫无例外地把土地出租给一点经营能力也没有的、日与死为伍的所谓“佃户”去耕种。地主但求做官。这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个是地主因为不须投入“资本”去经营土地，地就是全部长草，也亏不了本，而地租照收。因此，地主无不放心大胆去占土地。而占有土地的多少，往往与政治势力的大小成正比。做官占地，就成了众务之的。到南宋，终于出现了“吞噬千家之膏腴”，年收租百万斛的

贵势之家。在古代农业中，雇佣劳动并非不曾出现过，但对地主来说，雇人经营土地要出钱出力，且要冒风险，何如坐着做官，出租土地安稳？另一个是土地主要靠佃户去经营，佃户最穷也最“贱”，佃户越多，社会生产力就越下降。秀州农民全部变成佃户，说明农业到南宋已临绝境。

如此民安得而不怨？理宗以后，阶级斗争激化了。绍定元年（一二二八），赣州农民在陈三枪领导下起义，“出没江西、闽、广间，势炽甚。”（赵汝腾《庸斋集》卷六《资政许枢密神道碑》）斗争持续七年，到端平元年（文天祥出生前二年）才失败。地区之广，声势之大，时间之长，在南宋中晚期，可说绝无仅有。度宗咸淳年间，广西农民在秦孟四领导下起义，打到湖南。

“所至攫剽财物之外，出其余以散之贫者。”（《文集》卷七《循环历》）佃户的斗争，在理宗以后，也有发展。淳祐末年，秀州德清县的佃户发动过降斗斗争，“民蜂起附之，至数万人。”（黄震《黄氏日钞分类》卷七〇《申提刑司乞免一路巡尉理索状》）南宋末年，福建莆田的佃户发动抗租斗争，竟“廿载不纳主租”（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卷四《寿藏自志》）。

由上可知文天祥是在南宋内部社会危机严重化、阶级斗争白热化的时代诞生的。再说外部。

十二世纪兴起的蒙古，是建立在对奴隶（合兰、孛斡勒）和下民（合刺除）奴役的基础上的。战争成为官人（那颜）和他们的伴当（那可儿）经常的职业。《蒙古秘史》写到：

“星天旋转，诸国争战，连上床铺睡觉的工夫也没有，互相抢夺，虏掠。世界翻转，诸国攻伐，连进被窝睡觉的工夫也没有，互相争夺，杀伐。没有思考余暇，只有尽力行事。没有逃避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互